

# 识史集

唐振常 著



上海古

识 史 集

唐振常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125 插页 4 字数 188,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188-5

K·238 定价:11.00 元

## 集前 小引

陈寅恪先生倡导“在历史中求史识”，一生身体力行，并以之谆谆教诲学生。陈先生之作，无书无文甚而无诗不充满史识，且处处予人以智慧。心仪陈先生之说，命此集曰《识史》，非敢言此中有史识，乃学史之意，学而识之。这个识字，仿“不贤者识小”之义，志其小者也。

集中最后一部分六篇文章，可以说是学术论文。其中《韩愈排佛老议》、《派性考略》两篇早年之作，加上近年写的《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和《这案子翻不得》，但为排比史实，述其经纬。另外两篇，意在思索我对历史现象的困惑。其余绝大部分文章，只是读史稍悟所写的随笔。集中第四部分五篇文字，与历史无关，然从文化角度看，似亦是一种历史现象，便予收入。卷首二文，乃读新出写陈寅恪先生的一本书及吴雨僧先生《自编年谱》有感而写，是弟子献给两位老师之作。两位老师地下有知，不知对学生之说以为然否。

唐振常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集前小引► 1

---

# 目 录

|                 |               |
|-----------------|---------------|
| 集前小引/1          | 一个词语搅乱了历史/29  |
| 卓荦孤怀身殉道         | 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   |
|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 戌变法之二源/31     |
| /1              | 张元济与蔡元培/35    |
| 孤怀卓荦殉道真         | 黄远庸之死/41      |
| ——《吴宓自编年谱》读后/7  | 远生之忤/48       |
| 有感/13           | 远生时评/55       |
| 燕大无“四大名旦”之说/16  | 昆明徐霞客纪念馆所感/58 |
| 关于傅斯年/19        | 也说吴稚晖/60      |
|                 | 师承与变法/64      |
| 蜀中文化最关情/22      | 开放灯船与恢复乡试/69  |
| 闻万里桥拆/26        | 立异以为高         |
|                 | ——说辜鸿铭之一/72   |

辜鸿铭“不全集”

——说辜鸿铭之二/74

儒臣·大臣·功臣(上)

——说辜鸿铭之三/77

儒臣·大臣·功臣(下)

——说辜鸿铭之四/79

“贱种”——袁世凯

——说辜鸿铭之五/81

关于以西方之新复中国之旧的  
思考/83

以史为鉴说《甲申》/89

曾·左·李/93

李二先生非汉奸/98

再说李鸿章/103

刘公岛上念甲午/109

清末三屠/113

张之洞巧宦热中/119

张荫桓死得冤/124

张佩纶徒事空谈/127

清代总督与民国军阀/131

无大臣之风/136

善烹小鲜 可治大国/140

无道失德/142

知味难/144

一把辛酸写电影

——《李天济电影剧作选》序/146

有怀陈凡/150

韩愈排佛老议/154

这案子翻不得/181

派性考略/185

“训政”与“开明专制”

——一个历史现象的探索/214

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五四之反传  
统/224

从两次辞职事件论蔡元培/239

# 卓荦孤怀身殉道

---

##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

前以《孤怀卓荦殉道真》为题写成《吴宓自编年谱》读后所感(载《读书》杂志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今复以同样意义之题稍易其字,写作此文,盖以为今世学人唯陈、吴二先生最称得上终生守道、乐道、卫道、明道,终至于以身殉道,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二先生之一生亦密切不可分也。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而论《兵法》。”人生有此一苦,已不堪受,陈先生兼而得之(吴先生晚年亦受失明、断足之苦),所受之痛苦,远过古人,何其深也巨也!然而,以此视由于先生肩负学术文化的历史使命,“为此文化所化”极深,在此文化衰落之时,所受之精神上的痛苦(参阅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及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四十七页),则失明、膑足之身体上的痛苦,于先生可谓渺乎小矣。盖身体之痛苦,可以忍受,能够治疗;而心灵之痛苦,则难以忍受,不能治疗。

然而，陈先生所以异于流俗者，厥为对于此种心灵的痛苦早有所见，其忍受与治疗之方，乃为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起而保卫和发扬此文化。早在王静安先生自沉之时，陈先生即深知此文化使命之将终其身以任，心灵早有充分准备，是以能百折不挠，战斗到生命的终结。因此，陈先生能免于所断论的和王静安先生同样的以身殉文化的结局，王先生以身殉，陈先生以道殉，其实质同，其方式异。以身殉易，不过一念间之举而已；以道殉难，须持之一生而不衰。是以，陈先生能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诸多领域里留下鸿篇巨著，闪耀着先生生命的光辉，蕴含着先生毕生大声疾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万丈光芒。距陈先生逝世二十有七年，读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毕，益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数年前，三联书店潘振平君为编辑《陈寅恪先生全集》来沪过我，言及广东某君写了一本陈先生传，潘君力言其稿写得很好。此即近日新出的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得之，数昼夜阅读不能止，每至传神处，或掩卷太息，或废观泪流，或回思陈先生音容笑貌，或忍不住背诵陈先生的诗章。数日之间，低徊反复，情不能已，思不得绝。读既毕，掩卷而叹曰：陈先生承传继往，以生命为中国文化和学术留下了最光辉的篇章，是书作者以心血讴歌先生之人及先生之学，述而有作，其作岂只“很好”，而实多年罕见之佳构。侧闻作者陆键东尚为中青年，非治历史学之人，能成是书，能达如此佳境，真是愧煞陈先生门下。

作者以其著作表明了对陈先生的人格有很深的了解，对陈先生的博大精深之学有较深入的钻研，能领会，有见解。不只此也，作者更进而能将陈先生的人格力量和文化精神融而为一，写此即写彼，写彼亦写此，浑然天成。于是，陈先生之人，在作者笔下，正气凛然，千古所钦。陈先生之学，独立苍茫，境界空前。人与学相统一，人由学而表现，学由人而完成。作者以无限景仰的心情去写陈先生，敬其人，佩其学，高山

仰止，望之弥高，钻之弥深，不如此写不出陈先生。大处着眼，细处落笔，通读全书，处处见出正气凛然的当代硕学大师的风貌，而所环绕所以状陈先生随时呼之欲出者，厥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视书内间有叙述的与陈先生同代诸学人，其所不及于陈先生者，非唯学之不逮，更由于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之缺乏。无论书中写到的诸如新史学权威郭沫若，陈先生早年所佩服的陈援庵，以至曾有可望传陈先生之学的及门弟子汪篯、金应熙，皆是如此。

犹忆陈先生在成都燕京大学授课时，有传郭沫若将由重庆来听课之说，如为谣传，亦符当时的历史真实。此种可能性，随一九四九年之到来而消失，是以其后郭老对陈先生《论〈再生缘〉》的态度便索然可解。抄引拙作旧文一段：“郭老之文（按指《陈端生考》），自有卓识高见，而其大端，多寅恪先生所已言者，郭老未之标明，反取寅恪先生之作之小疵，从而标举之，亦一憾也。”（《重读〈柳如是别传〉忆陈寅恪先生》，载拙集《往事如烟怀逝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只涉《再生缘》与陈端生，郭老已采如此态度，其后之屡指陈先生之史学为资产阶级史学予以蔑视，可知矣。惜这位无产阶级史学权威晚年之《李白与杜甫》，陈先生已不及见了。然本书透露，陈先生称，郭老最好的作品是《青铜时代》，倒是大可玩味的。陈援庵先生自是极受人敬重的史学大师，然由政治之影响学术，两位陈先生在学术上晚年亦殊途矣。至于陈先生弟子汪篯、金应熙两位，由于受学术界极“左”思潮的影响，皆与陈先生决裂，前一位中道而殁，后一位且屡受命而批判陈先生，更可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易与可贵。我有幸在金应熙晚年借调香港时认识他，虽交往不多，亦感实是好好先生一位，唯其为好好先生，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叫“批判”谁便“批判”谁，落了个背叛师门之名，良有以也。

书中对于以上所列，除关于陈援庵先生一段外，都有较多的描述，甚至细致入微的刻画。作者掌握可信的材料，对照陈先生维护学术尊严的巍然不动的精神，便能使读者得到超乎所叙述的收获。正由于对

陈先生之人之学了解甚深,全书末章以《绝响》为题,论陈先生之学在中国文化上体现出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标举为以下三条之总结,就非常恰当。爰摘为之记如后:(一)陈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有影响者,是陈先生自成一体的文化思想——“历史文化观”,可分为“人与文化”及“历史与文化”两个方面。(二)陈先生的文化情怀与先生对中国历史的精深掌握密不可分。先生的文化视觉与“要摧毁、清算旧世界者”及“抱残守缺者”皆有本质的区别。先生眼中的历史,充斥着兴亡盛衰的痛感。先生视觉中的文化,紧紧扣着“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之主旨。(三)正因为有此支点,陈先生毕生对中国文化的信仰与追求,便有了甚为沉痛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心路历程的苦炼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灵魂号哭。以下作者从陈先生历年文字中共摘引了十三处以说明其所据论,而作结语云:“(这些引录),虽不足以反映陈氏文化思想的全貌,但已见用情之独切,冀望之独厚,苦痛之独深,其毕生的抱负昭然。”作者所论,发人深思。

此书的基础是翔实而可靠的材料。陈先生墓木已拱多年之后,搜集材料,爬梳成书,且有些材料,主管者也未必愿意示人,搜集之难,可以想见。书中所用材料,或见之于报刊记载,但大量是有关档案材料,凡所涉及陈先生以及其他人和事者,作者恐已涉览殆遍。文字材料有不足,则辅之以口头访问。被访问者除了当事人,还多有家属与友人。一人之说孤证不立,乃及于多人。多人而有歧说,乃采两说并存,作者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试举一例。一九六一年三月郭沫若拜访陈先生(此事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未载),根据访问知情者所得,书中对此作了较详的记载,叙及郭沫若曾当场口诵一联:“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聿陈瞽马牛风,”谓有另说:联系两人所对。作者采取两说并存的态度,似较相信前说。此事可留待读者判断,郭、陈皆是对对子高手,陈先生尤然,提倡以作对子锻炼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见所著《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此联下联对仗工整,具见功力,似为陈先生之作。

从两人相见时的情状论，郭是以居高临下的自得之情往访，有和缓之意，不会当面作“马牛风”这样对立的表述，陈先生以谈笑方式对下联，较多可能。

在材料翔实的基础上，作者写作一出以真实，不回避，不虚饰，读来真切感人。主人公陈先生是真实可信，是有血有肉，所做的事，所写的文，所赋的诗，纳入时代大背景，一以贯之，保卫与发扬文化而然。由陈先生而带出了一批人，一批学人，如吴雨僧先生、向达、陈序经、梁宗岱、刘节、蒋天枢、冼玉清，皆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写及一批官员，如陶铸、陈毅、胡乔木、康生、周扬等，各有其貌，亦皆真实可信，其中写与陈毅的会晤，最为生动，佐证和丰富了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谈叙欢洽”的记载。陈毅访先生，不谈政治，而专“论文说史”，尤其谈《世说新语》，深得陈先生之心，致陈先生几天之后对人说：“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托人找了陈毅的诗来看。写周扬拜访，多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没有写到已公布的周扬另一次讲话，是为不足。在这次讲话中，周扬对一九五九年访问陈先生表示了内疚之情，说是当年他不该激怒陈先生。而康生因陈先生以病拒绝会晤，恼怒报复，后竟以陈先生“反对社会主义”为词禁出陈先生的《论再生缘》，一段描述，具见其人。书中还写了一批环绕在陈先生周围的非名人，如黄萱、高守真、中山大学的护士、工友等，均显露这些人物对陈先生的真诚之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陈夫人唐筼师母，本书以专节描述守护在陈先生身边的这位志行高洁的人，最能理解陈先生的人，读之感人至深。从这个意义说，这本书已远超出了个人传记的意义，而写出了时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群，作者驾御全局之力，亦可钦佩。

文末，附述一个细节，言材料之尚可追探。

一九六四年，陈先生七十五岁，早年弟子蒋天枢到广州拜寿，抄录了陈先生诗稿一册，返上海后遍觅不得。书中记此，似有责蒋掉以轻心之意。今检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九六四年条载：“记曾录得

诗稿一册，归后遍觅不得，岂被窃欤？”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蒋天枢此书时，有不少文字刊落，我曾从友人处抄得全部刊落之文。按此条末句后尚有一句：“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被删。则此事尚有内情，未必即为蒋天枢粗心遗失。陈先生诗作，除赠人者，向少示人，蒋天枢是除了先生亲属最早得见诗作的人。在中山大学校内，有人曾多次想得到陈先生的诗，“以窥其心”。则蒋天枢之“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之语，恐非妄疑之词。

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自然知道陈先生的学术与人格，对陈先生极为尊重，但校内系（历史系）内，总也有人想整这个“资产阶级史学权威”，而当风暴一起，不管是否出于本愿，许多人也发疯了。于是，陈先生也就岌岌可危。陈先生对那些整人者，表示了愤怒之情是自然的。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被刊落的原文，抄两处以为历史之证。

（一）一九六九年条，“小彭（振常按：陈先生次女名）又回家探亲”下，有这么一段话：“（先生）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逼，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十二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蒋天枢注）”

（二）同年条，美延（振常按：陈先生小女）致蒋天枢信，“（先生骨灰）寄存在广州火葬场”句下，被刊落文为：“其他在广州书箱，一律送交中山大学（母亲意见），中大图书馆还想要存在复旦的书，想和复旦联系。由他们去搞好了。（中大好像以孤哀女继承人自居似的。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竟贪婪至此！）（下略）”

文字的刊落，使原貌不全不真，这自然非本书作者之事了，然说明材料尚可追探。

一九九六年四月一日

# 孤怀卓犖殉道真

---

## ——《吴宓自编年谱》读后

凡是见过吴雨僧先生的人，总难忘他那踽踽独行、喃喃自语之状。他一个人低着头走，不看前面的道路，不看左右周围的人群，唯喃喃自语，一似重有忧者。先生忧的是什么？忧的是世道人心，忧的是中国化学术。这本是在动荡的年代，世事处于混乱之中，特立独行之士所共有的思想状况，非独先生一人为然。先生所以异于他人者，按先生自己所说，他是两足分踏在两匹并驰的马背上，两手分握二马之缰，强欲使之比肩同进。这是先生著名的“二马之喻”，引原文如下以明：

宓设二马之喻。言处今之时世，不从理想，但计功利，入世积极活动，以图事功，此一道也。又或怀抱理想，则目观事势之艰难，恬然退隐，但顾一身，寄情于文章艺术，以自娱悦，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此又一道也。而宓不幸则欲二者兼之。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又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

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挚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必将受车裂之刑矣。此宓生之悲剧也。而以宓之性情及境遇，则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吾其奈之何哉！（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雨僧日记》，据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引）

先生为此分立二马之背强之比肩同进而苦恼了多年，正因为先生有此认识，为了使中国文化学术在西方新方法下（自然包括西方的新知）积极发展，先生是踏在马背而不能下，强行前进，行之多年，行之一生，至死而不悔。先生所谓的两面，历多年之践行，在他身上已趋于统一，即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秉此，可以理解，先生一生，除了授业、著述、诗文自娱之外，任事甚多，诸如：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年，创业之难，积聚一身。代王文显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其所规划，为大学的外文教学奠立可行之章。创办《学衡》，几乎是独力苦心经营十二年，出钱出力花时间，琐细到自己包扎《学衡》去邮局寄出。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辛劳备尝者六年。于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先生和一般纯然学者有所不同，能任行政之事，有办事的干才，做起事来，井井有条，仔细认真，讲求效率。如此等等，正是先生两足分踏二马胜任愉快的表现。

先生作“二马之喻”在王国维先生自沉昆明湖后十二日，先生与陈寅恪先生长谈，王国维先生托两先生以后事，两先生痛感于王国维先生“文化神州丧一身”损失之重大，为中国文化前途忧，而有倾心沥肺之语。雨僧先生“二马之喻”，表示了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的精神。寅恪先生答以警策出众的卓然之见：一国文化衰亡之时，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甚至不惜以身殉文化，如王国维先生即是。此语实是对雨僧先生将遭车裂语的肯定，雨僧先生即直道其事曰：“而宓则谓寅恪与宓皆不能逃此范围，惟有大小轻重之别耳。”一席倾谈，成为两先生面

对死者的誓词。此后数十年，两先生秉此素志以行，为中国文化树立了正气，为中国学人建立了榜样。

近年以来，相继出版了几部有关陈吴两先生的书，为两先生矢志献身中国文化作了很好的阐释，而赫然贯穿其间最足以表现两先生的精神者，即为两先生一生不移素志、至死不改初衷的风骨，亦即两先生一生坚执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近出版雨僧先生女公子学昭整理的《吴宓自编年谱》（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同属是类，而较之他书更足以见此精神。

书中学昭自述，她最早听见雨僧先生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是在一九六四年十月父女相见於四川内江火车站之时。雨僧先生其时已不获准许授课，乃告女儿以撰写年谱之想，“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感想，体例一采简括”。以后未再闻知其事。截至先生含冤去世之翌年——一九七九年，冤案平反后，学昭从发还的先生残存遗稿中发现《吴宓自编年谱》手稿，共一百三十三页。此是先生历年编写，未得完成，而于“文革”中被抄走。但写稿始于何时，则不得而知。此稿被抄走后，先生极为痛心，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四川梁平劳改），先生重新编写，共得七十二页，得以保存。两稿均是未完成之作。学昭对照两份手稿，加以整理，并补录先生失明后所口授内容，得成是书。此乃作者及其所作历尽灾难之后，留下来的一部记录，幸乎，不幸乎？学昭在是书《后记》中说：“遗憾的是父亲当年托付几位学生和朋友保管的许多重写的《年谱》散页，虽经我们多年进行种种努力，尚未能取得。我们仍然祈望这些同志给予支持，以求《年谱》更趋完善。”对于那些“保管者”乞求之情至殷，我不知道现在怎样了，“保管者”是否有归还之意？当年明火执仗的抄家者抄稿以图毁灭历史，“保管者”受托而保存历史，做了好事，今日不予交还，则其行迹与当年抄家者何异？其不交还之用心又何以自明？学昭《后记》中还说，先生自一九一〇年起开始写作之《日记》亦将出版，这自然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大幸事，然侧

闻先生《日记》亦有部分讨索不回，且公然言说就是不回归，更不知此种人是何用心了。

虽然如此，毕竟今天还能看见这部未完成的有残缺的《自编年谱》，藉以完整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一代学人之学之人之思想，得薪尽火传之用，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了。

先生当年告学昭自编年谱事时，说了一句话：“内容但求真实，真实！”此语重要之极，得史书写作之精义，见先生之为人与性情。今日细读全书毕，深感先生确是处处出以真实，写先生笔下的事，巨细无遗；述先生心中的情，大小无隐；于先生所持之对人对事是非曲直之见，丝毫不讳。有此三者，这本书乃成为有价值有意义之作。先生具有许多美德，如极富同情心，对人同情，对动物之遭受蹂躏亦极同情，书中多处写及对于骡之遭受鞭打表示痛惜。一生助人，读书时对同学，常以金钱帮助；教书时常多为人介绍工作。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更不惜牺牲自己以全他人。做事认真，可以说一丝不苟。对人真诚，绝无虚情假意。对长者尊者，极为尊敬，而于长者尊者处事之不合，则不讳言其缺失。如此等等，《年谱》中时有无讳无隐的记述。这些，都不是只受儒家学说薰陶的旧式学者所能做到，如按传统思想，这么写，会被认为是矫情或自夸。先生则按事之如何、理之如何、情之如何，直言无讳，具实写来，此所以为真实也。

先生受西方思想教育，崇拜卢梭，自述自剖，有如卢梭之写《忏悔录》，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先生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严，加以生性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在悔恨之中。先生和陈心一女士的婚姻，是先生多次悔恨的事。朋友陈烈勋不断敦劝，求先生和其姐陈心一结婚，先生对于未曾谋面的这一桩婚事，犹豫颇多，后来允婚，又复毁约，最后又由于至友汤用彤先生的一言，终复成婚。《自编年谱》中均历历如实道来，不作丝毫之隐。在美留学应为五年，只三年而提前回国，先生表示“多年后，悔之不及”。抗日战争

胜利后，先生不回清华，于先生可谓大事，此对于先生在解放后的命运关系重大，先生写了一段话：“然而大事，例如一九四九年四月，不回清华，又弃武汉大学而来渝碕（重庆北碕），遂走入相辉（相辉文学院），编入西师（一九五〇年先生任教的四川教育学院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则举动之极端错误，而祸害久长者也。”事实确乎如此，先生如去清华，其后来之命运，当不致如在四川之所遇也。小之至于一九六一年先生到北京，贺麟告诉先生，周扬曾主张调先生到中央文史馆任研究员，专力译沙克雷小说，因而愿陪先生去看周扬，先生未往。后来写到这段事时说：“若竟从之，后来周扬得罪，必致牵连。然谨慎不往，伏处西师，一九六八年以后仍受种种之惩罚与斗争，则何如其往耶？”

凡此，可以举出很多先生一生悔恨之事。但是，唯独一件，终生不悔，至死无怨言，那就是载负中国文化学术的重任，甘任二马车裂。这种精神，贯穿于全书，而可以标举本书一七六页先生所书一段总结性按语以明之：

然按后来事实之因果论之，则宓若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学年，仍留勿吉尼亚大学，而不来到波士顿转入哈佛大学，则与梅光迪在美国未由相识，无从接受其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并不获由梅君导谒白璧德先生，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则后来必无《学衡》杂志之编辑与出版。而宓一生之事业、声名、成败、苦乐，亦必大异，而不知如何。总之，一切非人为，皆天命也！

这正是对于一生所作为于中国文化学术无悔的宣言。请更引先生在悔婚约无效后的一段自白来看：“宓经此失败后，废然安于天命，今后不在婚姻与生活中追求幸福，而当在事业、文章、道德中自寻乐地。”先生安身立命自有境地。一九二一年，先生回国到上海后，写道：“此时期，宓所最系心者，惟宓之工作与事业。即是：赶速到东南大学教学、授课，及编撰、出版《学衡》杂志之二大事。结婚以及其他活动，只是为扫清道

路，排除障碍，俾必能从早、从速，用我之全力于此二大事也。”

《自编年谱》止于一九二五年，是以先生乐道、守道、明道、卫道的具体表现只是写及于任教东南大学及编辑《学衡》，此后则是创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大公报·文学》等一以贯之了。王国维先生死，先生于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渎罔以歿，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先生以此精神贯之，终而至于在一九五八年大倡厚今薄古之时，抗言“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文革”中不同意批孔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劳动改造，双目失明。终而至于含冤以死，真正如在王国维先生灵前所誓：以身殉道了。乐道、守道、明道、卫道，以至于殉道，先生历其一生，尽其所能，忍受了历史的灾难。然非由于欲兼两方面而遭背驰之马车裂，乃为极“左”路线所遭致，岂不哀哉！

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深夜